

邹云方 傅明和 编著

中國現代文學名著選評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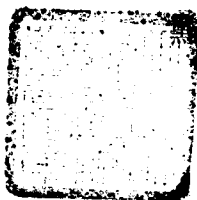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选评

邹云方 傅明和 编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88332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088332

责任编辑：杨明生
封面设计：安振家
封面题签：唐 骏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选评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Mingzhu Xuanping

邹云方 傅明和 编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佳木斯印刷总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13 12/16 · 字数 279,000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243

统一书号：10093·667

定价：2.10 元

17065/01

序 言

发端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实土壤上，一面继承了我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一面又吸收了外国文学的营养，以其高度的思想性和富有特色的民族形式，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在新的历史任务面前，不少的同志以勇于探索的创造精神，不断地开拓着新的研究领域。在这种形势下，为了与同行们交流教学经验和科研成果，帮助广大文学爱好者了解、阅读我国现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品，我们编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名著选评》一书。

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作家的社会实践的产物。作品一旦产生，它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了，是作家的一种富有个性特征的，独创性的艺术创造，具有一定的历史、社会、民族、阶级的以及表现在心理上、艺术上的种种特殊的规定性。同时又借助于审美的力量来实现文学所担负的社会职能。因此，在评价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时，应从他的作品出发，既要承认历史，又要尊重历史，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客观地论证作家作品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成就、贡献和影响，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

列宁对普列汉诺夫评价的思想，是我们选评中国现代文

学作品时恪守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普列汉诺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著名人物，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后来他犯了严重的错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评价时，既高度地赞扬了普列汉诺夫的历史功绩，同时又批判了他的严重错误。没有因前期的功绩而抹掉了后期的错误，也没有因后期的错误而否定了前期的功绩。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老作家沙汀同志曾说过：“如果每一个历史阶段仅有一两位卓越的作家为人民知晓，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作为历史里程碑而出现伟大‘五四’运动的国家，也太不相称了。”（《庐隐传·题记》）所以，本书除选评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等伟大作家的名著外，同时还选评了一些广为传诵，脍炙人口的其他著名作家的佳作。选评的范围，力求兼顾各个历史时期，不同流派和风格的作家的作品，努力做到所选评的名著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能真实地反映出我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面貌。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唐弢教授的关怀和指导，并为此书亲笔题签，我们由衷地感激。

因篇幅所限，这部书只选了五十位作家的五十部有影响的代表作。在对作家作品进行评论时，又由于作者的思想水平不高，学识根底浅薄，认识上一定未中肯綮，恳请专家、学者及同行们给予批评、指教。

作 者

目 录

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1
李大钊的《五峰游记》	12
胡适的《尝试集》	18
瞿秋白的《饿乡纪程》	28
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	35
刘大白的《卖布谣》	41
鲁迅的《阿Q正传》	48
郭沫若的《女神》	49
郁达夫的《沉沦》	68
许地山的《落花生》	76
冰心的《寄小读者》	84
田汉的《获虎之夜》	92
庐隐的《海滨故人》	98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	109
闻一多的《死水》	116
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126
殷夫的《别了，哥哥》	135
柔石的《二月》	143
张恨水的《啼笑因缘》	151

叶圣陶的《倪焕之》	161
✓ 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	169
✓ 蒋光慈的《田野的风》	175
✓ 茅盾的《子夜》	183
✓ 王统照的《山雨》	195
✓ 巴金的《家》	204
洪深的《五奎桥》	214
✓ 艾青的《大堰河——我的褓母姆》	221
✓ 叶紫的《丰收》	230
✓ 曹禺的《雷雨》	238
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	246
✓ 萧军的《八月的乡村》	252
萧红的《生死场》	259
✓ 沈从文的《边城》	266
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	275
老舍的《骆驼祥子》	283
① 夏衍的《上海屋檐下》	292
① 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	299
① 田间的《给战斗者》	308
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	317
① 张天翼的《华威先生》	327
冯雪峰的《真实之歌》	337
✓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	347
孙犁的《荷花淀》	356
✓ 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	364

欧阳山的《高干大》	375
陈白尘的《升官图》	383
阮章竞的《漳河水》	392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	402
贺敬之、丁毅执笔的《白毛女》	411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	422

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是“五四”时期，向整个封建势力进行攻击的一篇著名的战斗檄文。它的作者是陈独秀，写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为《新青年》杂志出刊三周年而作，发表在该杂志的第六卷第一号上。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我们看到了这块历史的碑石。

陈独秀，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人物。他参加发动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传播过马克思主义，发起并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是党的第一次至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的总书记。后来，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他成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使革命遭到了损失。在一九二七年党中央“八七”会议上，他被撤销了党的总书记职务，又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党籍。

陈独秀，字仲甫，安徽省怀宁县人，生于一八七九年阴历八月。青年时留学日本，是反满革命派，曾在芜湖编辑《安徽白话报》，一九〇三年在上海担任革命报纸《国民日日报》主笔。一九一一年，他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反清斗争，主张民主革命，反对君主专制。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二年他在安徽师范学堂任教务长（一说任校长）。一九一三年反袁斗争

失败后，他又东去日本，在东京曾佐章士钊办《甲寅》月刊，一九一五年回国，同年九月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杂志（第一卷称《青年》），任主编。

《新青年》创刊时，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的黑暗年代。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统治，产生了中华民国。但是政权很快落到了反动派袁世凯手里，革命失败了，连“民国”的招牌也岌岌可危了。袁世凯下令尊孔读经，极力进行帝制活动。封建卫道者们到处叫嚷恢复帝制发扬“国粹”，维护国俗，定孔教为国教。面对中国的现状，是尊孔读经恢复帝制呢？还是继续宣传民主，建立共和呢？许多人处于彷徨苦闷之中，找不到出路。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极大的不满，激起了他们要求摆脱现状，探求出路的勇气。于是一个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陈独秀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创办了《新青年》杂志。

《新青年》一问世，就遭到社会上一些人的强烈反对和非难。为了回答这些心怀恶意的旧势力人物的攻击、诬蔑和谩骂，陈独秀写了这篇《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这篇具有战斗性的议论性散文，共七个自然段，近一千一百来字。篇幅虽短，内容却很丰富。

散文的第一段，针锋相对地提出问题：“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呱呱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道。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得很，对于吾国革

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

这里所谓的“邪说”、“怪物”是什么呢？这里“离”的是什么“经”，“叛”的是什么“道”呢？翻开三年中已出版的三十大册《新青年》杂志，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新青年》一创刊，就高高地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封建专制主义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在它的具有纲领性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青年》创刊号）里，就历数了旧中国的黑暗罪恶，呼吁青年起来“利刃断铁”，“排万难而前行”，“战胜恶社会”。并向青年提出了六点希望：“（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文章明确地阐述了关于人权（即民主）和科学的思想：“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隶自处之义务。”“自人权（民主）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进而提出了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伦理民主的革命主张。“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在这茫茫的黑夜中，民主和科学

象两颗明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夜空中闪耀着光芒，使人们看到了希望，增加了力量。

民主和科学曾经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思想武器。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63页）的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在十七世纪提出过：“人类只有通过新的科学，才能成为自然的统治者和主人。”这一思想，沉重地打击了从中世纪以来统治人们思想达一千多年的封建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对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自十七世纪后半叶开始，法国封建统治者（从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与宗教教会狼狈为奸，血腥镇压第三等级的人民。封建君主以神授君权来推行“朕即国家”的独裁专制政策。法国民主思想的先驱雅克·卢梭（1712——1778）曾发出“人类生来就是自由的，可是处处都在桎梏中”的呼声，提出“天赋人权”的思想。这为摧毁野蛮愚昧的封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新青年》的战士们所宣传的民主和科学，就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思想宝库中学来的。

在思想革命的对垒中，《新青年》的矛头始终对准了封建的旧文化、旧礼教。陈独秀连续发表了《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觉悟》、《偶像破坏论》、《除三害》等文章，系统地批判了封建的伦理道德。他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

格矣。夫为妻孥，则妻子为夫之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何足言？”

（《一九一六年》）他号召青年、妇女打碎奴隶的道德羁绊，树立平等人权的新信仰，实现个性自由，“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他又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袁世凯复活》、《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等文章里，驳斥了康有为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的谬论。他反复在《新青年》上论证了旧礼教旧道德与民主政治势不两立的道理。这些反对封建礼教，主张民主思想的宣传，有力地痛击了旧人物的非难，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易白沙、李大钊、吴虞、鲁迅等都相继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参加了这一斗争。易白沙在《孔子评议》一文中指名批判了孔子：一为“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二为“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三为“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四为“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以上四事”被历代统治者利用，“作百世之傀儡”。李大钊在《青春》一文中揭露了封建社会所造成的那种“残骸枯骨，满目眈眈，民族之精英，渐灭尽矣”的罪恶，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表现了以“新造民族之生命”为己任的革命精神。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是一篇抨击封建家族制度、宗法道德、儒家伦理、专制政治的有力文章。

文章指出：“详考孔子之学说，既认孝为百行之本，故其立教，莫不以孝为起点，所以，‘教’字从孝。凡人未仕在家，则以事亲为孝，出仕在朝，则以事君为孝。能事亲，事君，乃可谓之为能立身，然后可以扬名于世。”“儒家以孝悌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是则儒家之主张，徒令宗法社会牵掣军国社会，使不克完全发达，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文章呼吁废弃儒家之道，大张共和之说，“虽蒙‘离经叛道’之讥，所不恤矣。”鲁迅稍后也参加战斗，他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无情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本质：在“仁义道德”的字缝里满写着两个字——“吃人”！“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的封建社会，在孝悌的背后，却是“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鲁迅在“五四”时代的主要著作绝大部分发表在《新青年》上，他的杂感、小说和论文，在青年中引起了极热烈的反响，成为我国革命思想史上一块放射光芒的丰碑。

在反对封建旧文化、旧礼教的思想斗争中，《新青年》的呐喊，犹如狂飙突起，震慑大地，催人猛醒。

一九一七年，《新青年》发动了文学革命，向封建的旧文学和文言文展开了攻坚战。首举义旗的胡适，一月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他提出了中国文学改革的要求：“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主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陈独秀继而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了《文学

革命论》，高擎“文学革命”的大旗，痛斥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反对“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阐发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社会文学”。他又进一步地提出了把文学革命和政治改革结合起来的主张，表示“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的决心。¹钱玄同以王敬轩的名义于戊午夏历新正二月给《新青年》编者写了一封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载《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的信，佯作提出诘难，反对白话文，拥护文言文。刘半农代表《新青年》编辑部于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九日写了《答王敬轩》（载《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一文，积极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当时人们把这两封信称之为“双簧信”。这成为“五四”时期新旧文学争论中的著名事件，深刻地反映了《新青年》战士们对封建的旧文学及封建卫道者的仇恨和发展白话文新文学的决心。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深深地击中了封建社会的弊病，狠狠地鞭挞了旧事物，热烈地呼唤着新的事物，“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一九一八年，《新青年》最早歌颂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正当协约国大肆庆祝欧战胜利的时候，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发表了他在天安门的讲演《庶民的胜利》和论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指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

世界”。同时给人们指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大战后，帝国主义必将走向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获得最后胜利的历史趋势。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正在寻找出路的中国先进分子带来了希望和光明，为中国的革命找到了新的出路。

以上就是《新青年》从一九一五年创刊到一九一八年这三年来，三十册刊物中所说的“极平常的话”。《新青年》战士们“离”的是孔门儒家倒退之“经”，“叛”的是封建专制主义之“道”，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向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狂风暴雨式的攻击。这一攻击，震动了整个社会，引起了封建势力的极大恐惧和仇恨，封建卫道者们才给《新青年》罗织了许多罪名：破坏孔教、礼法，破坏国粹、旧文化，破坏贞节、旧伦理，破坏政治、旧宗教等等。

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严正地指出：“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指民主）和赛因斯（Science指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钱玄同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发表了题为《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文章。钱玄同是《新青年》的编辑之一，是著名的音韵学家，和陈独秀等一起积极提倡文学革命。他在文章中就废汉字的问题说：“欲祛除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欲祛除妖精鬼怪，炼丹画符的野

蛮思想，当然以剿灭道教——是道士的道，不是老、庄的道，——为唯一之办法。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唯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国书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这两类之书故；中国文字，自来即专用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故。”这种言论，好像是“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来消除汉文书籍的固疾。这篇文章立即遭到了封建卫道者的强烈反对，各种攻击象一股浊浪排空而来，压向了《新青年》，怒骂钱玄同，讥笑钱玄同。然而《新青年》的战士们，却稳坐钓鱼船，陈独秀轻蔑地说：“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又郑重地指出：“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怒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陈独秀挑战地说：“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思和他辩论，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陈独秀最后“布告天下”：“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德、赛），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这是《新青年》战士们对封建势力的有力回答，也是向封建专制主义斗争到底的誓言。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彻底的反封建精神，就是这篇《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的主旨。

《新青年》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宣传阵地，在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唤醒了广大知识青年，并使他们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它培养了整整一代的革命家，在中国现代